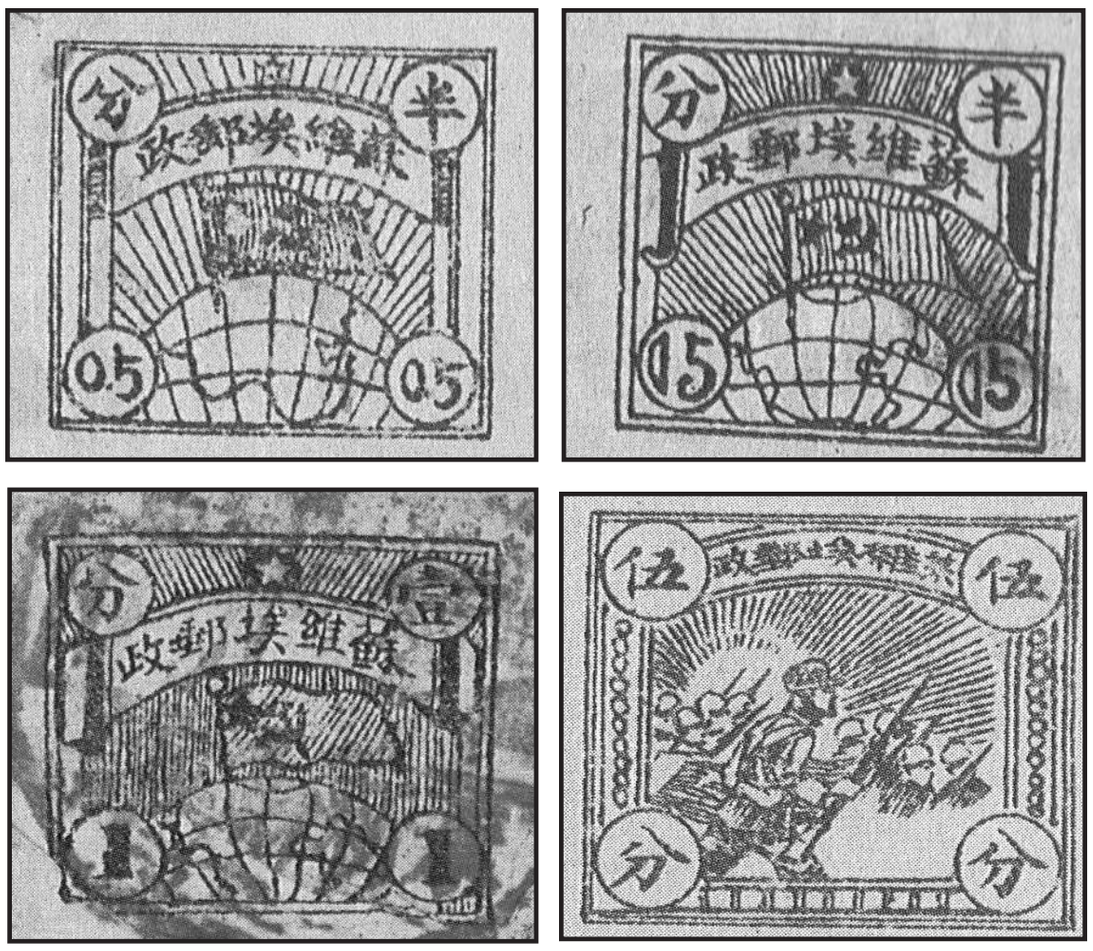
珍贵的中央苏区苏维埃邮政邮票

杨 华

1932年5月到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中央苏区共发行了15枚9种不同面值的邮票。这些邮票统称为苏维埃邮政邮票。苏维埃邮政邮票既是革命根据地通信的邮资凭证，又是具有号召力、感染力的宣传品，是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伴随着革命战争的需要设计与印制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珍藏的中央苏区苏维埃邮政邮票记录了这段历史。



苏维埃邮政邮票（部分）一九三二年

苏区邮政事业发展的珍贵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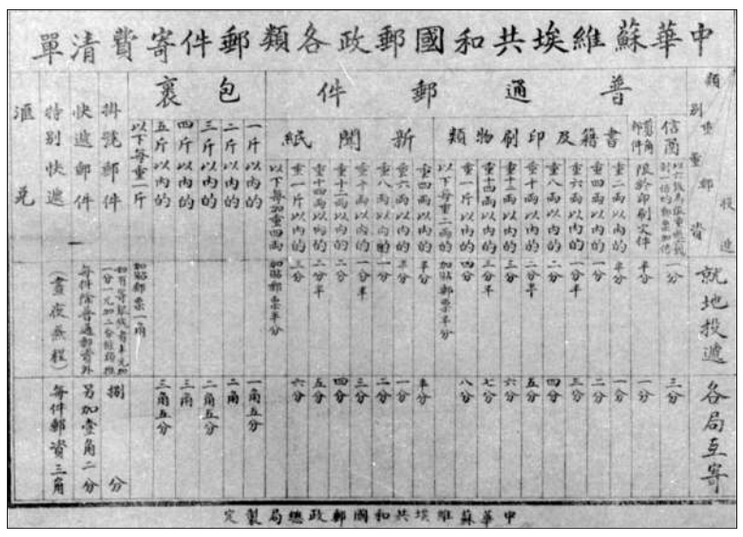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邮政邮票即是在中央苏区政权稳定、苏维埃邮政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发行的。

为了统一领导中央苏区邮政业务的开展，1932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开始整顿中央苏区邮政工作，4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发布《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的第一号布告和《整理苏维埃邮政统一组织统一办法》的训令。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成立，邮政总局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以下简称《邮政暂行章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各类邮件寄费清单》（以下简称《邮件寄费清单》），建立、健全了邮政组织机构和邮路干线，统一了苏区邮政资费，开始发行苏维埃邮政邮票。

苏维埃邮政邮票的图案按主图可分为9种，分别为球旗图、红军战士图、战士军旗图、工农图、苏维埃旗帜图、战士冲锋图、演讲图、行军图和欠资邮票等。

本文配图中，第一、二、三枚邮票的主图均为球旗图，三枚邮票图案基本相同，中下部为半个地球，地球上画有陆地，并标有经纬线。苏维埃旗帜树立在中华大地上迎风飘扬，旗正中为交叉的锤镰标志，锤镰左上为一五角星。地球上方的背景底图上绘有光芒状线条。铭记正中上方为一五角星。邮票图案四角的圆圈中，上方两角标有汉字的邮票面值“半”“分”“壹”“分”，下方两角标有阿拉伯数字的邮票面值“0.5”“1”。

第四枚邮票图案为红军战士图，图幅22×19.5毫米。邮票图案正中的红军战士头戴军帽，穿着军装，打着绑腿，持枪笔直站立。红军战士的背后左边是一闪亮的空心五角星，向外发散光芒状线条，右边是一面白底红色锤镰及五角星标志的苏维埃旗帜，整体表现了红军手持钢枪英勇保卫苏维埃政权。邮票图案上方两角圆圈中写有汉字的邮票面值“壹”“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各类邮件寄费清单（1932年）

第五枚邮票图案为战士冲锋图，图幅24.5×22.5毫米。图案为众多红军战士冲锋的场面，图案中间偏左最醒目的位置为一名红军战士，头戴军帽，身着军装，手持装有刺刀的步枪朝右方冲锋。战士们的背影绘有太阳发散光芒四射的线条。邮票图案四角的圆圈中，上方两角标有汉字“伍”，下方两角标有汉字“分”。

除此以外，工农图票面图案中部的圆圈中是并肩簇拥的工人和农民的正面图案，十分突出，他们的身后绘有光芒状线条。战士军旗图票面图案的构图与红军战士图基本相同，区别在于红军战士的背后，左边是红军五星军旗图案，右边是锤镰标志的苏维埃旗帜。标明面值“壹分”的两个圆圈内，底图绘有斜纹线条。演讲图邮票的票面主图为一名头戴军帽，身着军装的红军指导员高举双手正在演讲，他的背后是一队肩扛步枪的红军战士，他们的背后绘有发散光芒的太阳。行军图邮票的票面主图图案正中为肩扛步枪、列队行军的红军战士。旗帜图邮票的票面主图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这是苏区和革命的象征。旗帜正中锤镰标志立体感较强，锤镰左上为空心五角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欠资邮票的邮票图案正中为空白圆圈，内为楷书“欠资”两字，简洁明了。

苏维埃邮政邮票在设计过程中，注重邮票的规范性，端正了锤镰五星标志的标法，使象征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标志更加统一。在土地革命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锤镰图案一直处在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1931年3月1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明确规定了红军旗帜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样式，规定把五角星提到旗顶一侧，突出党的领导地位；交叉的镰刀锤子放在旗中央，突出工农阶级地位。五星、镰锤一律用金黄色，以增强美感。苏维埃邮政邮票将锤镰标志交叉朝左上方向的设计，统一了该标志在邮票中的规范使用。

特殊的设计

苏维埃邮政邮票的设计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人员黄亚光。他也是首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设计者。

黄亚光设计苏维埃邮政邮票既受到设计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的影响，也根据邮票的特点进行了独特的设计。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正在紧张地筹建国家银行，黄亚光接受任务时，先设计了纸币，后设计的邮票。

黄亚光设计纸币时，绘制了五角星、镰刀、红旗、工农集会等代表性元素，后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委托，创作设计苏维埃邮政邮票图稿。虽然他使用的工具只有毛笔和借来的一支圆规，但为了使邮票的设计达到最佳宣传效果，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进行创作设计，不断听取苏区群众和有关领导的意见，虚心修改，最终分两次完成设计图稿。

图稿上绘制的五角星、镰刀、苏维埃旗帜、红军战士等图案，既突出了政治色彩，又朴实、大方、精美，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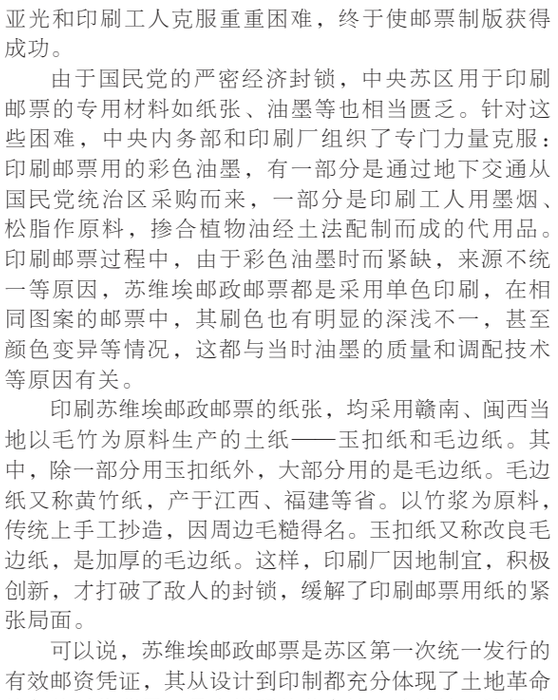
此外，《邮件寄费清单》中对各类邮件标准重量和邮资作了细致的规定，苏维埃邮政邮票的面值中，有资邮票为0.5分、1分、3分、5分、8分、1角、3角；欠资邮票为1分、2分，共9种面值。可以根据业务需要直接使用，或多种面值互补、搭配使用。

苏维埃邮政邮票的面值单位是银币券，是1932年3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后发行的新纸币。苏区货币以银圆为本位，银币券可以兑换银圆，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并要求银行做到随兑随换。统一使用银币券作为邮票面值单位，这就解决了各苏区邮资费不统一的问题，推动了苏区邮政事业的发展。

石印机印刷

中央苏区的印刷厂主要有四所：中央印刷厂、中央军委印刷所、财政部印刷所和少共中央《青年实话》印刷所。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8月在瑞金叶坪下坡坞建立。初时有铅印机4架、石印机8台。该厂铅印部专印刷《红色中华》报等报刊，石印部专印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1933年4月，中央印刷厂随中央政府搬迁，分出石印部建立财政部印刷所，主要印刷纸币、邮票、储蓄券、公债券等有价证券。因此，苏维埃邮政邮票1932年5月至1933年4月前均由中央印刷厂石印部印制，1933年4月后由石印部新成立的财政部印刷所印制。

中央印刷厂使用的石印机，是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共分为机台和机脚两部分，前后机脚向外弯曲，机台装有一块平面长方形青石板，棍状摇柄。石版印刷工艺精细、图案精美，因此主要承担印刷邮票、纸币等各种票证以及重要的布告、文件等任务。由于邮票面积小，制版难度也相对增加。黄亚光虽有印制纸币的经验，但对邮票印制却也颇费周折。印制邮票时，最初采用木刻版，因印刷效果不佳而改用石版。邮票制版的关键材料为照相用胶片，是通过地下交通和国民党统治区商人从广东潮汕一带秘密购进，由于困难很大，经常缺货。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黄亚光先将图稿画在纸上，使用石印机，运用墨染法技术将图稿压印在石版上，然后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制成若干子模再行翻印。用这种方法制版，速度缓慢而且工序非常繁琐，稍不注意就会压坏图稿。黄亚光和印刷工人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邮票制版获得成功。



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旧址（1932年-1934年5月）

由于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用于印刷邮票的专用材料如纸张、油墨等也相当匮乏。针对这些困难，中央内务部和印刷厂组织了专门力量克服：印刷邮票用的彩色油墨，有一部分是通过地下交通从国民党统治区采购而来，一部分是印刷工人用墨烟、松脂作原料，掺合植物油经土法配制而成的代用品。印刷邮票过程中，由于彩色油墨时而紧缺，来源不统一等原因，苏维埃邮政邮票都是采用单色印刷，在相同图案的邮票中，其刷色也有明显的深浅不一，甚至颜色变异等情况，这都与当时油墨的质量和调配技术等原因有关。

印刷苏维埃邮政邮票的纸张，均采用赣南、闽西当地以毛竹为原料生产的土纸——玉扣纸和毛边纸。其中，除一部分用玉扣纸外，大部分用的是毛边纸。毛边纸又称黄竹纸，产于江西、福建等省。以竹浆为原料，传统上手工抄造，因周边毛糙得名。玉扣纸又称改良毛边纸，是加厚的毛边纸。这样，印刷厂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才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缓解了印刷邮票用纸的紧张局面。

可以说，苏维埃邮政邮票是苏区第一次统一发行的有效邮资凭证，其从设计到印制都充分体现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政治性、阶级性和战斗性，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为创立人民邮政事业而保留下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物。

（作者单位：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盘

王建运

第33届巴黎奥运会刚刚闭幕，我不由想起自己珍藏的一只1936年第11届奥林匹克运会纪念盘，此盘迄今已整整88年矣。近90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几经变化，但奥林匹克精神始终未变，她促进人类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理念，将永远伴随激励世界各国人民。

这只纪念盘质地为茶色透明车花玻璃，直径18厘米，正面凹刻英文“奥林匹克·1936柏林”，盘中央刻柏林城市标记图案“柏林树”，盘背面则凹刻奥运会标记“五环”。查有关资料获悉：1936年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按惯例举办国要发行该届运动会的纪念品，于是这只由德国设计发行的“第11届奥运会纪念盘”便应运而生。据有关资料介绍，当年该纪念盘仅生产发行500只左右，主要赠送各国运动队领队和应邀来德国参加开幕式的各国嘉宾及政要。故在当年该纪念盘是炙手可热的纪念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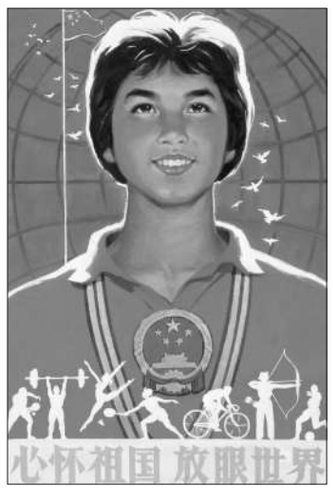
说起这只奥运会纪念盘收藏，还有一段不平常来历。约30年前，我有幸为一位老先生刻一方印章，老先生非常喜爱，说：“你虽不是名家，但刻的这种字体款式对我路，我喜欢。”然后拿出了这只纪念盘要送我。我一见此盘有来头具有纪念意义，忙推辞说：“这东西太珍贵了，万万使不得！”不料老先生执意要送我，我见推辞不掉，情急之下将手中一把名家落款的折扇送给老先生。老先生先还不肯收下扇子，在我坚决要求下方笑纳，于是彼此两乐，甚为愉悦。

听老先生介绍，此纪念盘在他家已存放了近半个世纪，他父亲是上海著名实业家“鹅牌”针织品的创始人，当年接济帮助了流浪至上海的一位德国犹太人，那人最后离开上海时为表谢意，说：“无物相送，只能将这只伴随他一路颠沛流离逃亡的纪念盘相赠了。”由此可见，这只奥林匹克纪念盘在这位德国人心里位置是多么重要。此件玻璃制作工艺品能未毁坏完整保存至今，实属珍贵罕见，它见证反映了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

（作者单位：上海市杨浦区政协）

宣传画《心怀祖国 放眼世界》

董昕昕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重视及推动下，体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体育健儿在世界舞台屡创佳绩，标志着新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

1965年，运动员徐寅生发表文章，提出“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口号，引领了体育界及各行业争上游、作贡献的热潮。广东籍艺术家刘秉礼亦深受鼓舞，积极响应号召，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宣传画《心怀祖国 放眼世界》。作品通过女运动员个体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

该作品定格在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体坛的获奖瞬间，她面带微笑、眼眸明亮地看向前方。画面构图简洁又不失饱满，在蓝色背景衬托下，暖色调的人物成为视觉中心，前方的白色顶光勾勒出人物的外轮廓线，将其形象映衬得坚实且生动。艺术家着重刻画了人物的神情，其热情、自信和昂扬的状态，极富感染力及感召力。前景为各体育项目的剪影，代表了体育健儿积极拼搏的整体面貌，背景以红旗、白鸽等代表性元素点明中国及世界和平的主题。该作品语言精练，造型概括，色彩鲜明，富有平面装饰性，带给观者愉悦的审美体验。画面中，作者未交代具体奖章，以人物胸前绸带象征荣誉，并夸张放大胸前的国徽尺寸，寓意着荣誉属于祖国和人民，正如艺术家所言：“她不仅是我国女运动员的代表，而且是祖国人民的光荣，是振兴中华的象征。”

宣传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传播和宣教功能，成为极受群众欢迎的艺术种类之一。经艺术家们的不懈探索，新中国宣传画得以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发展高峰，涌现出非常多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成熟作品。这幅作品以纯熟的艺术语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这个时期体育题材宣传画的典范之作。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唐代陶驯马郎俑

付 裕

陶驯马郎俑，唐，高40厘米，宽3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马舞，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马按照一定的音阶、动作演出的一种舞蹈。《明皇杂录》曾有记载：“唐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

由于对舞马的喜爱，唐代同样重视对驯马郎的培养。一般，驯马郎多为年少俊美之青年。所穿衣服多为利于驯马的胡服。故宫博物院藏陶驯马郎俑展现了少年驯马郎身手矫捷、轻巧灵便的样貌，作品生动传神，仿佛其正引领着舞马踢踏应节，闻乐起舞。